

图腾神话

与

中国

传统人生

刘毓庆 著



图腾神话

与

中国

传统人生

刘毓庆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陈来胜

装帧设计:曹春

版式设计:程凤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图腾神话与中国传统人生/刘毓庆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4

ISBN 7-01-003602-0

I . 图… II . 刘… III . ①中华民族-民族心理-研究

②图腾-文化-研究-中国-古代 IV . C95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0359 号

图腾神话与中国传统人生

TUTENG SHENHUA YU ZHONGGUO

CHUANTONG RENSHENG

刘毓庆 著

人 人 书 出 版 发 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2 年 4 月第 1 版 2002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14

字数:330 千字 印数:1—3,000 册

ISBN 7-01-003602-0/G·210 定价:23.00 元

序

香港著名歌星张明敏唱：“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叫中国；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他们都是龙的传人……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

学界泰斗季羡林先生说：“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

张明敏先生唱出了中国人的自豪，他是一位出色的歌唱家，他的声音发自于一个中国人对自己民族的挚爱与深情；季羡林先生道出了中国人的自信，他是一位优秀的国学大师，他的声音发自于对民族命运与民族文化的深刻反思。这歌声使我激动，这预言使我振奋。我喜爱这歌声，我相信这预言！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中国龙”遭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厄运。19世纪是“东方巨龙”备受屈辱的世纪。18世纪，“东方巨龙”高昂着头，雄视于东方，成为世界瞩目的天国。1840年一声炮响，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在硝烟中“巨龙”垂下了头，继而被迫与英、美、法等列强签定了《南京条约》、《望厦条约》、《黄埔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1857年英法联军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美、俄趁机入伙获利，中国再一次被迫与列强签定了一连串不平等条约。1860年英法联军侵入北京，野蛮抢劫，火烧皇家园林圆明园，皇帝仓皇逃走。继而俄国侵占我北边150多平方公里领土；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攻占我大连、旅顺、威海，掠取我台湾及附属岛屿。19世纪末，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进入20

世纪，中国史的开篇第一页便是：“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接着是日寇侵华，野蛮杀戮。中国人的尊严在帝国主义一个世纪的再三欺辱与蹂躏中丧失殆尽！在民族备受屈辱的痛苦之中，一批仁人志士站出来了！他们呼吁变法图强，振兴民族。然而一次次的变法失败和对外战争的屈辱性结局，使他们终于意识到了一个令人难堪的事实：中国民族病了！于是一场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运动开始兴起。

20世纪是“龙文化”遭受大批判的世纪。1984年，柏杨先生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做了一次报告，报告的题目赫然是“丑陋的中国人”！一时海内外华人大哗。暮气、保守、奴颜、愚昧、虚荣、势利、怯懦、肮脏、内争、麻木等等，竟然成了国民的根性，这是任何一个中国人在感情上都不能接受的。其实，柏杨只是变奏着19世纪末与20世纪前半叶中国哲人的旧调而已。早在19世纪末期，活跃在中国政坛上的一位拖长辫、着长袍的少年书生，就大声疾呼：当今的中国“积数千年之沉疴，合四百兆之痼疾，盘踞膏肓，命在旦夕”。他就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改良主义政治家、宣传家、杰出的学者梁启超。开始他指斥中国的官僚“一官数人，一人数官，牵制推诿，一事不举”，“朝为市侩，夕登显秩”，继而怒斥中国的政治“自秦迄明，垂二千年，法禁则日密，政教则日夷，君权则日尊，国威则日损。上自庶官，下自亿姓，游于文网之中，习焉安焉，驯焉扰焉，静而不能动，愚而不能智”，终而则悟出了中国衰弱的根源在我们民族自身。必须进行大破坏，冲破文明进步的阻力，扫荡魑魅魍魉的巢穴，才能使民族获得新生。^①五四以来，一批热血青年面对中华民族的病态，痛心疾首，奔走呼号。陈独秀奋笔疾书说：“中国人民

^① 梁氏观点见《中国积弱溯源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变法通议》、《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等篇。

简直是一盘散沙，一堆蠢物，人人怀着狭隘的个人主义，完全没有公共心，坏的更是贪贿卖国，盗公肥私……”^① 胡适更是愤怒地喊道：“今日的大患在于全国不知耻。”政府乱收公卖税、吸户税、过境税，最高官吏倡导时轮金刚法会，有 5000 年历史而没有 40 年的大学，能养千军万马而不能实行义务教育等，都是中国最大的耻辱。^② 陶行知看到国民在精明的老面前所表现出的愚昧痴呆，非常难堪地说：“中国有两种病，一种是‘软手软脚病’，一种是‘笨头笨脑病’。害‘软手软脚病’的人，便是读书人，他的头脑一定靠不住，是呆头呆脑的。而一般工人、农民都是害‘笨头笨脑病’，所以都是粗手粗脚。”^③ 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也明确地指出了中国民族之幼稚、老衰、消极、暧昧、不团结、不诚实；林语堂于其大著《吾国吾民》中也毫不掩饰地说：“吾国之民”遇事忍耐、消极避世、超脱圆滑、因循守旧；张君俊深感国人萎靡虚弱、无责任心、少勇气、无毅力、无远见、尚空谈，特撰写了两卷《中国民族之改造》。鲁迅先生撰写了惊世之作《阿 Q 正传》。通过阿 Q 的形象，更是把中国人的丑陋描写得入木三分。

当一个人打着自己的嘴巴，骂自己不是人的时候，很少有人会感觉到他的滑稽，而体味到的是他心灵深处的痛苦，那种撕心裂胆的痛苦！梁启超、鲁迅、陈独秀、胡适、柏杨……他们的心无不在滴着血！痛苦源自于思索、反省和醒悟，它蕴藏着一个深深的祈求，那就是“旧我”的死亡与“新我”的再生。只有旧有生存形式的消失，才能带走痛苦；也只有痛苦，才孕育新生。惟有清醒者，才能感

① 见《新青年》第 9 卷《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

② 见《胡适与中国文化·信心与反省》，台湾水牛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4 年版。

③ 《陶行知全集》，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 卷第 605 页。

受到痛苦。也只有因清醒而痛苦的人，才会为民族的出路做出思考。中国人发现自己的种种病态，无疑是有划时代意义的。因为这意味着觉悟，意味着荣辱感的转变，意味着羞辱史的结束。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主席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虽然人们对这场运动有种种诠释，但有一点十分值得注意：其将这场运动名之为“文化大革命”，说明毛泽东主席看到了中国社会的种种病象，其根乃在中国文化上。“破四旧”的行为，实是企图用一种极端的手段，改造中国文化。这就是说，20世纪最优秀的学者与最伟大的政治家，都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着反思、批判与改造。

我们不赞成用暴力手段改造文化，也不赞成像柏杨先生那样拉大嗓门地叫骂，而主张像梁启超、鲁迅等那样对中国文化进行分析与思考。笔者的这本小册子，正是自己长期以来对中国传统文化思考的结果。闻一多先生有一篇被当代神话学界奉为经典的文章，叫做《伏羲考》，在这篇大文中，闻先生写道：

龙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我们的答案是：它是一种图腾(Toten)，并且是只存在于图腾中而不存在于生物界中的一种虚拟的生物，因为它是由许多不同的图腾糅合成的一种综合体……这综合式的龙图腾团族所包括的单位，大概就是古代所谓“诸夏”，和至少与他们同姓的若干夷狄……龙族的诸文化才是我们真正的本位文化，所以数千年来我们自称“华夏”，历代帝王都说是龙的化身，而以龙为其符应，他们的旗章，宫室，舆服，器用，一切都刻画着龙文。总之，龙是我们立国的象征。直到民国成立，随着帝制的消亡，这观念才被放弃。然而说放弃，实地里并未放弃。正如政体是民主代替了君主，从前作为帝王象征的龙，现在变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象征了。也许现

在我们并不自觉。但一出国门，假如你有意要强调你的生活的“中国风”，你必用龙文图案来点缀你的服饰和室内陈设。^①

闻先生的观点我并不完全同意，但有一点我是非常赞同的，他认为龙文化是中国的本位文化，龙是由“许多不同的图腾糅合成的一种综合体”，这是十分有道理的。笔者对于龙的研究，目的就是要从考察中国人崇拜的图腾入手，追寻民族文化生命之根，探讨中国原始文化与传统人生之间的意义联系，从根本上认识民族文化的本质特征，从而为龙文化的改造、中国龙的腾飞，提供理论上的依据。

长期以来，我与一些学术界的朋友论及中国文化的时候，往往要发生争执。特别是与搞外国文学、现代文学与西方哲学的朋友讨论中国文化时，这种分歧似乎不可调和。他们的主张大多是要彻底抛弃传统，认为中国落后于西方国家，病根就在中国文化自身。有不少朋友，纯以西方的价值观评断中国文化，不仅认为中国文化是落后的、腐朽的，而且认为中国文化必在世界性的大竞争中被淘汰。也有朋友认为，在当今世界全球化发展进程中，文化的冲突已成为一个举世瞩目的问题。西方文化随着其强大的高科技术力量，摧毁着众多的文化资源，每天都有一些地方性文化在冲击中消失，中国文化也难逃此劫。我的认识则恰恰相反。我认为中国文化不但不会被淘汰，而且在 21 世纪还会为解除人类面临的重重矛盾与苦难，发挥其特殊的作用。对全人类来说，无论中国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尽管时下美国的商标、名牌风靡全球，崇洋心理驱动着一部分中国青年追求西方式的生活。但人类未来的文化选择，并不会有国别、民族上的歧视，而是以有益

① 《闻一多全集》，三联书店 1982 年版，第 1 卷第 33 页。

于人类生活的美好发展为前提的。美国的肯德基、麦当劳,风行于大陆;同样中国餐馆也享誉于世界。

从龙图腾的形成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中国文化存在的特点与优势。我们之所以相信中国文化在 21 世纪会发挥其主导作用,乃是基于对龙文化的认识而言的。这种文化有两个基本精神,第一是“包容精神”。龙图腾能将许多不同的图腾糅合成一种“综合体”,即显示出了这种文化极大的包容性。在中国人的习俗生活中,也处处可体现出“包容”特点来。如中国的不少庙宇中,既有和尚,同时也住着道士;庙宇中的塑像,有时是儒、道、释三家的始祖同处于一个殿堂上。在民间的信仰中,一个堂中烧香,所祭的可能就有四五位神。有的巫婆还声称自己堂中有三四十位神。从中国历史的发展中,更可以看出中国文化的包容性特色。这种包容精神,表现在汉民族滚雪球似的不断接纳、吸收不同种族,成为自身一分子方面。从南北朝时期的五胡政权,到元、清两朝的蒙古、满族政权,一个个都被中原民众所接受,而这些民族却逐渐失去了自我,同化、消融在了中国大家庭之中。

中国民族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文化包容史”,是在不断地与周边民族以及远方殊国进行能量交换中发展的历史,是与异质文化不断接触、冲突、融合的历史。在中国历史上,有过三次文化大冲突、大融合运动。每一次文化大冲突、大融合,都是在两种乃至多种文化长期积累(接触)的基础之上产生的。这三次文化大冲突、大融合,对中国历史及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第一次文化大冲突、大融合,是在先秦时代,其性质是中国各地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虽然中国本土民族文化的冲突与融合,贯穿于整个上古史中,但奠定中国文化基础与性质的两大文化系统,即以商为代表的太阳文化与以周为代表的太阴文化的接触,则是在神话时代末期,即商代晚期才开始的。经过千年的接触、积

累,终于爆发了战国的文化运动。这场文化运动,对积累千年的中土异质文化,进行了批判、选择和融合。并且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新的经济体制出现的基础上,产生了以荀子思想为主导的新的意识形态,开始了中国大统一的历史。荀子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兼容道法各家,创立了君主专制理论,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有人认为中国文化思想的统治者是孔子,其实是荀子,孔子只是招牌。林庚先生曾说:中国文化曾受三个力量的支配,其中之一就是儒家而近于法家的荀子^①,这无疑是很对的。

第二次文化大冲突、大融合则是在宋代,这一次面临的则是东方文化的冲突、融合。自秦汉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即开始与中土的儒、道文化发生关系,经过了近千年的积累,到宋代又爆发了一场文化运动。这次文化运动,中国传统的儒学思想,并未因强大的佛教文化的冲击而改弦更张或消亡,相反对冲突已久的佛教文化进行了批判、选择与融合,使儒、道、佛东方三大文化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产生了新儒学——理学,影响了中国历史七百年。

现在我们面临的是第三次文化的大冲突、大融合。现存的文化的冲突,不同于往昔的中国本土文化、东方本土文化的冲突,而是东西方两个世界、两种人生的冲突。从 13 世纪开始,西方文化即开始东渐。到 19 世纪中叶,经过了约 5 个世纪的接触、积累,终于爆发了文化的大冲突、大融合。西方文化以其强大的物质力量,粉碎了中国皇帝的天朝梦,使朝野震惊,志士担忧。从而中华民族开始书写耻辱史。一次次地遭受侵略,一次次丧权辱国条约的签定,惊醒了中华民族的一代热血青年。他们对民族传统的正宗文化产生了怀疑,怀着振兴民族的壮志,把目光转向了西方世界。他

① 林庚《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3 页。

们在那里发现了科学、民主的曙光。于是开始了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掀起了新文化运动。这个运动可从 19 世纪末康、梁变法算起，现在仍在继续。在这场文化运动中，我们相信中国文化将会像以往一样，发挥其巨大包容性的优势，在合理接纳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文化思想与意识形态。

随着历史上的几次文化大融合，“中国龙”的形态也在发生着变化。第一次文化大融合，使龙开始脱去了爬行动物的特点，而呈现出了飞腾之势，并开始了新一轮的自我完善。这标志着中国民族的强盛、兴旺与发达。第二次文化大融合，使龙接纳了大量新的文化元素而定型，形成了今天随处可见的蜿蜒多姿的艺术形态，同时也失去了昔日的刚猛，标志着民族文化的成熟与稳定。第三次文化大融合，龙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从文化、经济、政治、民族觉悟等方面考察，我们所面临的条件与前次文化运动相比，已有了根本性的不同。前两次文化运动，每次都要持续二三百年之久，此次可能也要持续到新世纪末期才能结束。这个漫长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冲突、融合、物我相化的过程。

文化的大冲突与大融合运动，第一次出现在铁器广泛使用、原始农村公社经济与奴隶制经济解体的时代，铁器打破了原始的封建割据，使民族统一。故而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新的意识形态，使专制文化统治了中国。第二次出现在印刷术发明的时代，印刷术虽使得东土文化短距离、大面积地传播、交流，却不能引起生产关系的革命，也不能在短时间内与地球的另一边对话。因此使中土文化只是在旧的基础上自我完善，而不能易心革面。但其所创造出的有别于传统儒学的意识形态，照例统治了中国数百年。这一次则与前大不相同，它出现在轮船、飞机、大炮、电报高度发展的时代。这些现代工业的巨大发明，从外闯入，携带着西方物质文明，

使中国经济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现代印刷业把西方文化系统地输入中国；巨轮、飞机打破了大洋高山的阻隔，将大机器、大设备及现代工业的最新产品，源源不断地运入中国。电报、电话、互联网，彻底动摇了国人传统的时间和空间概念，现代工业打破了国人的固有观念，发明农耕的牛神被人们冷落，四个现代化成了民族奋斗的目标。民族经济与观念、心态的这种变化，决定了此次文化运动的成效，将大大有别于以往的两个时代。

前两次文化运动，只是对近距离文化的融合，并未能在宇宙间找到一个参照系统，对自身作出反省。而此次，有一个迥异世界的文化展示在我们眼前，它的强大冲击唤起了整个民族的深刻反思。因此这场文化运动，它已唤起了全民族的觉醒，是由知识分子领导、全民投入的文化革命运动。虽然其间由于拯救民族实体的抗战斗争和保卫新生的共和国的思想政治斗争的冲击，拯救民族灵魂的文化运动出现了数十年的断裂，然而随着思想领域的解放，一场浩浩荡荡的文化运动却以从来未有的声势展开了，它以冲决一切障碍的气势，唤起了每一个血肉之体。这昭示着一个彻底扭转民族命运的光辉前景。

根据现存的条件与文化运动的气势、方向，结合前两次文化运动的发展规律，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预测：

一、每次文化运动，其最终出现的权威性的意识形态，都是其时代最早出现的意识形态。开启战国百家争鸣时代的，是儒家“克己复礼”的第一声呐喊，而最终形成的权威性意识形态也是儒家思想。开启两宋文化运动的是理学，而最终形成的权威性意识形态也是理学。这次文化运动，是对中西方两个世界文化的综合批判、选择和改造，是文化史上的第一次远缘杂交。其目的不在于维护某一种文化的尊严或优势地位，而是要创造一个新的世界，每一个思想家的心底，都翻腾着创造意识。在寻找民族和民族文化出路

的志士仁人心中,特别是思想家的心中,是不存在权威或一成不变的权威的,这场运动将会出现更激烈的争鸣,在新世纪的中期或末期,一种新的先进文化形态将会基本形成,这次文化的基本内涵,便是近代以来志士仁人所呼吁的“科学、民主、自由”。

二、每一次文化运动的末期,都会出现一位总结该时代思想的巨人,荀子、朱子就是这样的巨人。在新世纪中叶前后,中国将会产生与荀子、朱子相当的第三个思想巨人。但这个巨人不会像荀卿、朱熹那样,只是一个大儒,一个思想家或理论家,而可能是像孙中山、毛泽东一样,是一个政治家、思想家、革命家集于一身的巨人,也可能是一个巨人集团。他们的自身素质应堪与孙中山、毛泽东相比。他们是在全开放的思想文化氛围中,熏陶出来的大批思想家中的一个或一群。

三、中国文化的包容性特点,将会使中国人对全人类文化做出新的批判、选择与融合,形成自己的文化优势。中国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与新的文化思想结合,必将会使中国在新世纪里走在世界的前列。同时,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将会消除现代世界的种种纠纷,成为世界大团结的粘合剂,因而成为人类的明智选择。20世纪,整个世界处在了一个用枪炮对话、用商品对话的时代。市场竞争、利益争夺、政治势力范围的划分,使人类陷入了冲突斗争之中。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心灵留下了深深的创伤。罗马尼亚裔美国作家、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艾里·魏瑟尔,描写其20世纪的经历是“穿越欧洲的死亡列车”,是“明斯克和巴比雅尔的墓穴”,是“老人和儿童沉默着走向灭绝工厂”。人类正踏上不归之途,前面不知是通途还是深渊。哈佛大学教授斯坦利·霍夫曼认为:20世纪是一连串的屠杀。现代科技被用来大规模杀人,高积累的“工业化”造成饥荒,西班牙和阿尔及利亚打内战,在柬埔寨、卢旺达,还有中美洲,都在进行大屠杀。波兰律师萨缪尔·皮萨则认为:20世

纪在血腥中开始，在血腥中结束，现在只等着看世界在核战之后回归史前。^① 人类还能沿着这个方向发展吗？如果没有中国的包容精神主导这个世界，人类的前景将不堪设想。人类在反思着自己，文化在反思中走向自觉。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中华文化在新世纪面临的挑战》一文中，特意强调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并说：“看来二十一世纪将开始出现‘人类文化的自觉’了。在新一页人类文化发展史上，应该有中华民族实现文化自觉的恢宏篇章。”^② 这是智者之言，也将会成为事实。

中国文化的第二个基本精神是“和谐”。“龙”能将许多不同图腾的各种不同元素，统一于一体，在飞腾变化之中呈现出优美和谐的姿态，这种和谐精神，确是举世罕有的，也是充满着战争冲突、经济纠纷、政治斗争的现代世界所急需的。而以龙文化为本位的中国文化，则突出地表现出了“和谐精神”在文化与历史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绝高地位的孔子，他所提倡的仁、义、礼、智、孝悌、忠恕等，一切带有温情的道德观念，无不是以“和谐”为基本精神的。所谓的“仁”，实际上强调的是人内在心性的和谐；“义”则是强调平等关系的和谐；“礼”是强调上下关系的和谐；“智”是强调自我与外物的和谐；“信”是强调彼此心理联系上的和谐；“孝悌”是强调血缘内部关系的和谐；“忠恕”是强调集团内部关系的和谐。孟子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谓“与民同乐”，实际上俱是和谐精神的具体化。而《中庸》所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荀子《天论》所谓“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则是从哲学上把和谐精神

① 参见《中华读书报》，2000年9月21日《国际文化》版《一阵钟声一阵风》。

② 《文艺研究》，1999年1月。

认作了宇宙的最高法则。

与儒家并称为战国显学的墨家，其持论虽与儒家不同，而其基本精神则是相同的。墨家最主要的主张是“尚贤”、“尚同”、“兼爱”、“非攻”。“尚贤”、“尚同”，是强调政治上的和谐；“兼爱”、“非攻”则是强调社会整体的和谐。拼命攻击儒、墨的道家，虽否定儒、墨为恢复社会秩序、建立相互间的和谐关系所做的努力，而他们自己却在不知疲倦地追求着人格内在的和谐和人与自然的和谐。他们认为和谐是自然的本貌，“人为”是宇宙和谐的破坏力。顺其自然，废除人为，宇宙才能保持和谐。法家则是要通过“人为”达到社会的稳定和谐。“黄帝之治天下，置法而不变，使民安乐其法也。”^① 儒墨法道，殊途同归，他们都是以追求人类社会的和谐为指归的。

中国文化的和谐精神，也体现在了文化的各个领域。中国古老的医学理论认为，人的生命是以体内阴阳为依据的，体内之阴阳变化必须与外在自然的变化相适应，生命活动才能正常。《灵枢·本神第八》说：“故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是则僻邪不至，长生久视。”内在阴阳和谐，则百邪不能侵入。中国的诗歌理论则倡导“温柔敦厚”，倡导诗歌调和人伦关系的功能。如《诗大序》说：“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同时也主张诗歌对人心理的平衡作用，所谓“不平则鸣”，所谓“三百篇大抵皆圣人发愤之作”，都是从平衡功能而言的。而司空图所谓“诗中有虑犹须戒，莫向诗中着不平”，则提倡的又是诗境的和谐。音乐理论则强调音乐的和谐本质。如阮籍《乐论》说：“夫乐者，天地之体，万物之性。合其体得其性则和，离其体失其性则乖。”

① 《艺文类聚》卷五引申不害语。

昔者圣人作乐也，将以顺天地之性，体万物之生也。故定天地八方之音，以迎阴阳八风之声；均黄钟中和之律，开群生万物之情气。”绘画理论主张神与物的和谐及画境的和谐。如符载《观张员外画松石序》说：“观夫张公之势，非画也，真道也。当其有事，已知遗去机巧。意冥玄化，而物在灵府，不在耳目。故得于心，应于手，孤姿绝状，触毫而出，气交冲漠，与神为徒。”认为只有神与物化，心灵与外物完全和谐，才能得心应手，使神韵自现。王维《山水诀》谈布局，所谓“主峰最宜高耸，客山须是奔走”，“渡口处只宜寂寂，人行须是疏疏”，也完全是以画境和谐为原则的。书法理论主张运笔着墨的和谐。“扬波折节，中合规矩，分间下注，浓纤有方，肥瘦相合，骨力相承。”^① 在行为上则主张“圆”，因为圆是保持与外物和谐的形态。如褚人获《坚瓠馀集》云：“惟圆则无障碍，故曰圆通；惟圆则无毁缺，故曰圆满；惟圆其机常活，变化出焉，故曰圆转。”

总之，和谐是中国文化一种最基本的精神。最能体现中国这种精神的是“太极图”。太极图半黑半白，白的半边有黑点，黑的一边有白点。这两部分相互矛盾，又相互制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和谐地处于统一体中。惟其矛盾，故能运动；惟其制约，故能和谐；惟其和谐，故有极强的运动感。像一高速旋转的物质，使人感受到了它的气韵与生命的律动。这一图式凝定着先哲们对宇宙本质的认识及智慧。内外和谐是物质运动与生命存在的根据与条件，宇宙运动的目的是在追求永恒的和谐。任何事物内外一旦失去和谐便走向崩溃。基于这种认识，故中国的先哲们倡导和谐精神，为消除世界的纠纷做着不懈的努力。

当今世界正面临着种种难题。医学的发达，保证了出生人口的成活率，使得地球人口急剧膨胀。而大规模的现代建筑，使森林

^① 萧衍《梁武帝集·答陶隐居论书二》(《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

耗竭,土地沙漠化,地球的耕地面积日益缩小。为了保证人类足够的食物,人不得不利用现代工业所创造的化肥、农药,提高农作物产量。但农药、化肥的使用,改变了农作物成分,且使食物遭到污染,威胁到了人类的健康与生存。同时工业与大城市的发展,造成了地球的严重污染。仅美国工业界每年就要排出有毒物质 1000 万吨。大量工业废弃物不仅污染水源,污染空气,而且也造成了气候的异变,成了人类生存的大威胁。更可怕的是核工业的发展,使人类拥有了足以毁灭自己几十次的核武器。一旦核战争爆发,人类除了毁灭,别无选择。还有,高度发达的社会,紧张的生活节奏,使人际关系失去了温情,人们感到了世界的冷漠与精神的空虚,感到了生存的疲倦。西方世界每年都有相当多的人自杀。一个小小的日本,每年自杀的人数就多达两万余。人类想征服自然,自然却以百倍的猖狂报复人类;人类想征服异己,结果更加大了各种力量间的对抗;人类想发展高科技,打开通向天堂之路,而文明却背叛了主人,将人类一步步拖向地狱。这种种难题,除了用中国的和谐精神去化解,还会有什么良方呢?费孝通先生说:“我们相信中华文化中还有许多特有的东西,可以解决当今人类面临的很多现实问题,甚至可以解决很难的难题,这是可以相信的,不然哪里会有绵延了五千年的巨大活力。”^① 人类需要和谐,宇宙需要和谐,只有和谐精神才能化解世界的仇恨以及人类的贪婪性与侵略性,使世界各国平等地坐在一起,使人与自然友好相处。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说:如果中国文化不能取代西方成为人类的主导,那将是人类的悲剧。世界需要中国文化,中国的和谐精神,将会成为世界因竞争而弄得疲惫不堪的人们的惟一选择。

西方文化一个多世纪以来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主导,虽然为人

^① 《文艺研究》,1999 年第 1 期。